

中国主流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以《绝地重生》为例

◆周宇轩

[摘要] 我国一贯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教育,每年都会根据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精心制作并推出大量主流电影。近年来,主流电影逐渐收获观众的认可,成为国产电影的中坚力量,既能广泛传播主流价值观,又深受观众欢迎。英模人物作为主流电影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对其塑造方式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电影,更加具有典型性。本文立足主流电影,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需求,剖析中国主流电影人物塑造的特点。

[关键词] 主流电影;儒家文化;人物塑造

DOI:10.3969/j.issn.2097-1443.2024.03.014

电影作为融合多种艺术的影视产品,更加便于观众学习和接受其中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电影《绝地重生》是一部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而拍摄的电影,以中国红军长征路途中的重大转型时期为背景。影片讲述了通过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共产党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并对党内的领导团队进行了确定。同时,在长征途中,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化被动为主动,为长征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凸显了共产党人即使面对险境也绝不退缩的精神,并巧用计谋突出重围的智慧。在塑造每一位人物时,电影都结合了其真实历史事件,并融入了中国文化与当下社会需求,使得人物极具典型性和时代感。

一、主流电影人物塑造的特点及嬗变

(一)主流电影的发展

主流电影是中国众多电影类型中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类型之一,它融入了大量的时代发展内核,并结合中国建设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当下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进

行宣传,旨在激活观众心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遏制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涌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观看文艺电影的风潮,1987年在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上,时任中国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创作原则^[1]。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明确了主旋律电影为我国电影创作的核心类型。主旋律电影是指“以弘扬社会主义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精神为宗旨,以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内容为指针,以激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目的的重要题材电影”^[2]。显然,主旋律电影通过展现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内容,成为了传播官方话语的重要途径。它旨在强化党中央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并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主旋律电影开始将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商业电影推广模式进行结合,并参考市场喜好,推出全新的“新主流电影”,并收获观众的认可。所谓的新主流电影,“就是结合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的主流商业电影,其能够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

[作者简介]周宇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价值观,能够满足大众对于电影的期待”^[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主流电影在传递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加强了与观众的情感联结。这种兼具品牌意识与市场意识的主流电影,将内涵拓展至兼具教育意义与娱乐价值,成为新时代下中国电影的主力军。

(二)主流电影中人物的塑造

主流电影多选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战役或事件为背景,在该事件当中的英模人物和典型人物成为电影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因素。因此有别于其他类型电影。主流电影当中的人物最为特殊,对推动叙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成为该类型电影当中的核心。“形象是虚构的符码,形象永远代表着意识形态的意义。英雄作为一个符码必须服务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产生的英雄形象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英雄才能作为一个经典的符码存活下来。”^[4]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要贡献的英模人物,通过大量的宣传与教育工作,让这些人物的形象与事迹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脑海中扎根。每一部主流电影都是围绕某位英模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展开的,对于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这部电影的口碑评价与是否叫座。因此,人物作为主流电影当中的核心元素,对其塑造的成功与否与电影的最终走向密切相关。

西方电影的涌入促进了中国电影体系的改革,院线制的出现改变了主流电影以往以政治导向作为第一要义的创作导向,主流电影也必须把观众的需求纳入到电影的创作当中。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断更迭,观众更加看重电影的娱乐性,更加关注电影的人文主义情节。他们的关注点从电影剧情逐渐转向人物本身,对电影中伟人的平凡面和普通人的伟大面都更加渴望了解。新主流电影对正面角色的塑造采用了平民化的视角,快速地拉近了英模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电影着重讲述英模人物的个人成长过程,他们也会经历犯错,展现出部分人性的缺点,从而实现了从“完美的

人”向“完整的人”的自然转化。电影对正面人物的塑造由“神”到“人”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普通人突破自我和找寻自我的过程,向观众传递出新时代的平凡信念感,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细微小事也在默默感染着观众,潜移默化地把电影中主流价值观传递给观众。同时,新主流电影也展现了反面人物的闪光点,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中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让反面人物的性格也更加饱满。反面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堕落与正面人物成长过程中强大的信念感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正面人物异于常人伟大的一面。电影中大量融入情感元素,使观众对角色产生情感共鸣,进而实现意识形态的有效传达。此外,新主流电影也加强对小人物的深度塑造。在电影中,这些性格饱满的小人物,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往往能绽放出人性的光辉,将战争的残酷性与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艰辛与挑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电影通过对人物成长与国家进程的完整叙述,赋予观众强烈的真实感,使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三)儒学与人物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定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5]主流电影当中对人物进行塑造的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它在中华五千年的长河中历代传承,不断结合时代特色向前发展,儒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韩愈是儒家文化的连续性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原道》这一著作当中,对儒家文化承上启下的连续性有着清晰的分析:“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6]。在儒家文化延续的过程中,孔子是其中枢纽,他整理了自伏

羲氏至周公期间的所有思想,并周游列国进行传播,孔子死后虽然儒学产生了分化,但核心思想绵延至今。主流电影中的英模人物,正是对儒家文化的大量汲取,才能发挥其符合中国社会及时代需求的思想言论,他们既是儒家文化的学习者,亦是传承人。主流电影对人物进行塑造之时,会大量汲取儒家文化,这样既符合人物的历史原型,又符合时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主流电影在对人物塑造时,会结合儒家思想,依据人物的品德进行正反面角色的立场划分。中国儒学研究专家安靖如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在个人道德的体现主要分为“成圣”和“外王”两个阶段。“成圣”是个人对儒家文化的接纳和个人德行约束的过程;而“外王”是个人在社会当中看待不同社会现状的外放^[7]。孔子在列国对儒家文化传教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君子”与“小人”的概念。“君子是儒家对具备高尚品德、道德修养的人的称呼”^[8],小人则与君子完全相反。这样的思想核心,也成为中国社会对个人评判标准的约定俗成,对社会中符合儒家文化和社会礼仪,并具有崇高品德之人称之为“君子”,“小人”则是与之相对。主流电影结合儒家文化中对“君子”与“小人”的描述,对电影中正反面角色的塑造,成为其电影类型的塑造范式。

二、《绝地重生》人物塑造分析

(一) 正面人物塑造分析

1. 毛泽东人物塑造分析

《绝地重生》对毛泽东外形塑造时,虽依然还原了历史中真实的人物形象,但是并没有完全按照脸谱化进行塑造,其外貌造型更像一位普通的红军军官,其偏向于平民化的塑造方式可以快速拉近观众与角色直接的距离。同时,角色使用湖南式的普通话而非标准的湖南方言,降低了观众的理解难度,人物动作在遵循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并没有刻意达到一致,动作的出发点遵照与人物本身,可以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快速代入到人物当中对

剧情进行解读,更加利于电影中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学习与解读。除此之外,电影结合场景对于毛泽东进行塑造时,也采取了主流电影对正面人物惯用的塑造方式。

儒家文化认为,君子坦荡荡而坦然,且遇事泰而不骄。《绝地重生》中结合了该思想观点也对毛泽东的人物性格,进行了同样的塑造方式。在遵义会议中,会议清算博古等人的领导错误,并谈论是否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在会议上坦然点烟,对个人荣誉完全不在意。在巧渡金沙江胜利之后,面对红军的一致肯定,君子泰而不骄,毛泽东认为不可掉以轻心。同时,面对不同的战争态势毛泽东会将《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与实际现状相结合。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面对复杂的战争,毛泽东并没有刚愎自用,而是查找古籍,尊重圣人的思想和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是非常君子的行为准则。此外,电影也对毛泽东对原则的坚持进行详细的塑造。在扎西会议当中,毛泽东与补给部领导在对战事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总是和而不同,即使面对分歧,也是基于事件本身,对于意见相左的人也可以给予极大的尊重,因此在扎西会议的结尾,毛泽东与该领导握手言和。

共产党历来坚持群众路线,这不仅符合儒家文化中对社会层面的约束,也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儒家文化认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毛泽东面对在扎西的风雪之夜食不果腹的祖孙俩,把自己身上仅有的食物提供给他们,并向他们保证: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就是替人民解决苦难问题的。长征之徒的艰辛是中国历代战争中无法比拟的,行军过程中有多位尚未成年的小红军因望不到头的艰险而苦不堪言时,君子学道则爱人,毛泽东擦拭他们脸上的泪水,对他们进行鼓励并施以及时的帮助,与小红军一起克服长征中的困难。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君子总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人物。《绝地重

生》中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位威严庄重,似有娇矜之气,却不会与人相争,他宽容忍让,能够与大众和谐相处的人物形象。这既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再现,也是对观众心中对毛泽东记忆的再次确证。

毛泽东与贺子珍相处的情节,向观众展现了毛泽东形象当中不一样的侧面,即有别于领袖形象,作为丈夫和父亲形象的展现,让人物更具温情。《绝地重生》中,对毛泽东丈夫和父亲的形象塑造是交替联合在一起向前推动叙事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从丈夫角度而言,毛泽东去迎接寻找情报的贺子珍,体现了一位丈夫的担当;为刚刚临盆的妻子送去仅有的鸡蛋,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关爱。从父亲角度而言,毛泽东抚摸贺子珍肚子,向观众暗示他对这位尚未出生孩子的期待。毛泽东再爱这位孩子,面对妻子和数万名红军战士的安危,还是决然地把孩子送走。面对经历母子分离而十分悲痛的妻子,毛泽东还是投身于指挥战斗当中。观众会随着毛泽东感情的变化而感同身受,了解到他面对信仰可以放弃小爱,他异于常人对原则的坚持,感动着每一位观众。电影通过情感塑造人物,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距离。

2. 其他主要正面人物塑造分析

在《绝地重生》中的周恩来,主要负责辅助毛泽东,起到推动叙事发展的作用。相比于毛泽东的外貌形象,对周恩来人物形象塑造中使用了更加偏向于脸谱化的塑造方式,几乎与历史中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外貌完全相似。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以为乱。面对党内对到底是正面对抗国军还是绕路去打鼓新场产生的分歧,周恩来先是基于敌我的实情进行判断,之后并未草率行军,而是收集情报,等待时机,做出更加正确的判断,君子不止有勇,更是对道德的尊重和敌人的敬畏,照顾大局后做出行动,是周恩来其君子形象的体现。同时,周恩来始终坚守仁义,作为红军长征中的核心人物,他照顾到每一位同志的情绪,并在适时的时候改变政

策,选取更合适的人选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与共产党走向胜利。电影对周恩来性格进行全方位的塑造,并将大量情感元素融合到事件当中,让观众了解到事件的侧面,满足观众对于人物的期待,让观众更加全面的解读人物,接受人物身上传递出的主流价值观念。

儒家文化认为,国的力量是最为强大的,而家跟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家国两难的抉择是,君子会选择“先国后家,移孝作忠”^[9],会为了国家的发展而放弃个人的融入。同时在中国社会当中,“‘破家为国’‘忧国忘家’得到了权利的认可和表彰,成为意识形态”^[10],个人对于国家的优先性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伦理道德之上的原则。在遵义会议上,共产党对博古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运动的失败进行清算,决定罢免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担任。博古并没有对权利过度的迷恋,反而自省自己的错误,并着手整理资料,为职务的交接做准备,并认为毛泽东是可以拯救红军与危难的人物,比自己更加适合这个职位。在博古身上,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对于信仰的坚持和国家发展的敬畏,是每一位共产党人的缩影。

(二)反面人物塑造分析

1. 蒋介石人物塑造分析

从人物外形塑造角度而言,《绝地重生》在蒋介石的塑造中并没有使用非常明显的脸谱化塑造方式,但相比于同时期蒋介石的照片,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会更加凶狠。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认知中,小人总是阴险狡诈,孔子也同样认为,小人穷斯滥矣。这样的人物往往会在面相的显现中更加凶一些。可见从蒋介石刚刚出现,观众通过其面相对人物性格进行判断,先入为主地为角色划分阵营,以便于与随后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递。

从人物性格塑造角度而言,则是通过对儒家文化中对小人的形象的描写中大量汲

取,结合历史中真实的人物事迹和社会对于蒋介石的普遍认知对人物进行塑造。孔子认为,小人骄而不泰,接人待物总是充满高傲与自负。在电影当中,蒋介石从来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每当红军遭受重创,他总是非常骄傲的召开大会对官兵进行炫耀,对蒋介石骄傲而自负的人物性格刻画德淋漓尽致。同样,每当国军遭遇挫折或者剿灭失败,蒋介石会急于使用军法处置将军,从未从自身角度进行反思,儒家文化当中,有“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的看法,面对错误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位人物截然不同的处理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影意在向观众展现,红军可以走向胜利的必然性因素。

有别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绝地重生》中对蒋介石的塑造并没有只展现他性格中单方面的恶,也有体现出他这一人物高光时刻的片段。在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士气逐渐高涨。蒋介石及时改变策略,通过修筑城堡来加强防御并在鲁班场战役中重创红军,展现了蒋介石在军事谋略上的长处。同时,这样的塑造方式也改变了早期主流电影时期正面角色节节高升;反面角色节节败退的惯用叙事方式,让战争的复杂性展现在观众面前,突出了战争对于人的摧残及红军领袖的谋略,即符合观众对于新主流电影的期待,又凝聚了意识形态对于观众的影响。除此之外,电影也对蒋介石军人之外的人物身份进行了塑造,在临近新年设宴款待众人,并为夫人准备一场盛大的烟花。电影把蒋介石的人物角色塑造的更加立体,除了具有人性的缺陷,也是一位智慧且浪漫的人物。对人物普通化的塑造可以让观众观影的向叙事偏移,通过大量的对比镜头,突出共产党军队在面对艰难和危急时刻凸显出的红军精神,通过重温历史接受政治方面的教育。

2. 其他主要反面人物塑造分析

《绝地重生》中并没有对除蒋介石之外的其他反面角色有着过多的情节铺设,其人物性格也不似几位主要的正面角色进行完整的

塑造,但即使这样,依然对国民党方的两位核心成员陈诚和杨永泰进行比较清晰的塑造。电影对蒋介石的副手陈诚的人物刻画,完全遵照儒家文化当中对于小人的塑造方式。虽有部分才华,但不知天命且不畏,他狂妄自大,完全不把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其他国民党高层放在眼里,完全是一幅骄而不泰的态度。同时为了向利益和权利靠近,他残害同党,献媚于蒋介石,是一幅完全弃仁义于不顾的人物形象。但是他面对战局有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不会一味赞同蒋介石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也会反对蒋的部分主张。在电影当中,面对两位人物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蒋介石也有不同的回应。他更加信任与陈诚,在多次会议中对杨永泰多有冷落。这两位角色不同的命运,对蒋介石这一人物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塑造,他冷落忠臣,选择与小人为伍,也从侧面做实了蒋介石小人的人物特点,对国民党中其他人物的塑造方式,也是基于主流电影非常强的政治目的。

(三)女性人物塑造分析

随着1995年中国首次将“男女平等”纳入国策当中,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的权利,加之国际女性主义观点也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女性思想的觉醒。在新主流电影中,女性角色从战争的旁观者转化为战争的参与者,同男性角色一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推动叙事的发展。电影也对女性角色有了详细的塑造,并非早期主流电影中仅展现模糊的剪影。

贺子珍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并没有藏匿在丈夫背后,被动地等待援助,而是像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投入到战场之上。土城战役失败以后,怀孕的贺子珍即将临盆,但是她拒绝使用担架,面对战争勇而无畏,立刻指挥着红军的队伍,英勇地参与到战斗当中。观众透过贺子珍角色本身,看到一位女性红军的觉醒,每一位红军都是战士,无论性别与身份,都是应该被后人铭记和尊重的人民英雄。电影在对人物进行塑造的同时,将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与时代需求相贴合,更加体现时代精

神对于创作的诉求。

此外,电影还对她善良的本性和对原则坚持的性格进行刻画。她对于其他红军的爱护,超过了自身。在转移途中遭遇敌军偷袭,一位伤兵暴露在敌人的视野当中,贺子珍虽负伤,但是依然想保护这位伤兵,她选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掩护。孟子认为:“君子至于物也,爱尔弗人;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在此场景中,将士掩护士兵、强者拯救弱者,电影同样选择了“君子式”塑造方式对贺子珍这一人物进行刻画,相比于男性角色,更加具有穿透力,将红军为了信仰和国家及人民的期望,可以并肩作战甚至舍生取义。“君子”是对红军的集体称赞,并非某一性别的专属符号。同时,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电影也对贺子珍这一人物性格中坚毅的质量刻画出来。《三国志》中,记载着关羽在刮骨疗毒过程中没有表现出痛苦,反而与他人谈笑风生,被后世称为将帅之表率。由于红军长征途中麻药缺乏,贺子珍在非常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医生对她的外科手术。在取出体内残存弹片的全过程中,贺子珍攥紧床边并大汗淋漓,依然坚持到手术结束。不仅如此,手术后浑身是血的贺子珍,还在安慰其他战士和毛泽东。其毅力和勇气,历来都是被中国社会歌颂的人物形象。观众通过剧情将自身代入到剧中的人物,也会感受到手术过程中遭受的巨大折磨,贺子珍不仅在安慰剧中人物,也在安慰观影的观众,塑造出来的人物完全震慑着观众的内心。

《绝地重生》不仅将贺子珍塑造为一位女性战士的形象,也对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作为一位母亲,贺子珍将刚刚出生的孩子送予他人后,崩溃彷徨;面对村民不小心遗弃的婴儿,她不假思索对其进行哺育。作为一名妻子,虽然在与丈夫呕气,依然走向街头为他搜集报纸,并将丈夫的喜好牢记于心,寻找毛泽东最爱的辣子。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学者戴锦华教授认为:在中国社会,女性长期困于“雌木兰”的困境当中,想

要被后人铭记,就必须“像男人一样”。电影对贺子珍的塑造将这一现状进行打破,让女性回归于女性本身,她虽然是红军战士,但依然具有女性的本质特征,她不需要成为“男性”,依然可以收获观众的尊敬。此情节的设置将情感溶于事件,不仅将人物形象塑造地更加全面立体,更是对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再次表达。贺子珍对孩子的爱,没有逾越过原则,依然听从党政的决议,将孩子送出大部队;对村民遗落的孩子,贺子珍再过于眷恋,依然把孩子送回到父母身边;贺子珍对毛泽东的情感宣泄,并没有改变她对于信仰的坚持和战友的保护,带领小分队走街串巷寻找报纸,只为争取红军下一场的胜利。观众通过电影中人文主义情节的表达,将政治政策与现实完美融合,给予观众足够真实的体验,观众在重温长征历史的同时,也接受着红军战士鼓舞与激励。

(四)小人物塑造分析

传统主流电影中,多使用宏大叙事聚焦到某一领袖人物或某一重大事件当中。随着观影习惯的改变,主流电影也从宏大叙事转移到聚焦个体叙事,在新主流电影时代,塑造了很多出彩的小人物。《绝地重生》对军队中班长进行详细塑造,这里的班长并非单指某一位人物,而是聚焦到职务本身,讲述其传承的过程。在士兵眼中,军队各长官中最亲近的便是班长,班长与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生活,与他们联系最为紧密,也是士兵最为眷恋的人物,班长的牺牲对于一个士兵而言意义非凡。土城战役中,老班长为了掩护牺牲在战场之上,新上任的班长继承了他的信念。在鲁班场战役中,面对敌人建筑的堡垒坚不可摧,新班长集结了所有的手榴弹,准备利用自己的生命为红军换取机会,并提前安排好之后的班长人选。作为一位普通的士兵,没有领袖人物那么伟大,在战斗当中也不能提供战略性的建议,但是依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必死无疑的抉择,为了红军的胜利,慷慨赴死,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从一位小人物

身上投射出来,往往比领袖和伟人更能震撼观众。除了与红军精神的融合,电影还展现了“班长”人文主义的一面。因吹响的集结号,这个班的战士得以保留,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即将面临的战争。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新班长拿出老班长遗留下来的木板,像老班长那样在上面写下简单的汉字为士兵进行教学。或许在下一场战役之后,这块木板也要易主,但是他就像火把一样,点燃在每一位战士心中。对“君子”的追求从来都不是哪一类人群的专属,他是每一位有信仰和追求的中国人毕生目标。在红军长征过程中,有数以万计的班长倒下,也有数以万计的士兵继承了他们的精神。电影当中的班长只是万千红军士兵的缩影,他们或许不耀眼,但是他们伟大,小人物的不平凡之举,往往比大人物更加影响观众,通过对小人物注入情感的塑造方式,观众更会对人物身上传递出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感同身受。

三、结语

随着观众对电影需求的转变和观影习惯的变化。主流电影也在经历转变,其中经济和商业因素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可能正在增强。虽然主流电影开始将观众的需求纳入到电影的创作体系,但政治属性并没有被削弱,该类型电影依然发挥着向观众传递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人物是主流电影的主体,历史中这些真实的英模人物,他们既是儒学的学习者,也是儒学的传承人,他们以“君子”为目标,成为受爱戴的伟大人物。主流电影使用儒家文化中“君子”的描述方式对正面人物进行塑造,使用儒家文化中“小人”的描述方式对反面人物进行塑造,这既尊重历史

中人物的事实,又符合观众对于他们的普遍印象,因此成为主流电影惯用的人物塑造方式。

新时期的主流电影结合时代需求,提升了对女性和小人物的塑造,使这些角色成为性格更加全面,能够推动叙事发展的角色。从观众角度而言,女性角色和小人物与观众生活贴近、容易产生共鸣的人物。将这些角色与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相融合,对于观众的影响往往会比英模人物更加强烈,成为传递主流价值观和强化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 [1]张莹.新时期以来主旋律电影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50-56.
- [2]彭吉象.艺术概论(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84-385.
- [3]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202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22:94.
- [4]王海洲.城市、历史、身份——香港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194.
-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8:163-164.
- [6]韩愈.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4.
- [7]黄玉顺.论儒学的“进步”与“自由”观念——“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再比较[J].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3(04):16-20.
- [8]刘雅婷.儒学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与当代价值[J].文道纵横,2023(23):196-198.
- [9]张辉.天下无父母之国:古典儒学视域下的一种家国关系[J].国际儒学(中英文),2023(04):27-29,35.
- [10]尾行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M].张鹤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147-149.